

烟台故事

奚啸伯
在只楚土戏台唱过戏

徐源和

中国京剧界泰斗奚啸伯(1910-1977),是与谭富英、马连良、杨宝森齐名的“四大须生”之一,其唱腔清新雅致、委婉细腻,被誉为“洞箫之美”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他曾经在烟台西郊只楚村简陋的露天土戏台上,演出过京剧《空城计》。

当时的只楚村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大街,大街两头分别连着两条公路,是村里的交通要道。大街东头有一眼甜水井,全村都到这里挑水吃。井的南边有一个整块石头凿成的大水槽,有现在的浴盆那么大,是村里人洗衣服用的,平时成了小孩们玩耍的地方。大街旁除了住户之外,还有供销社商店、村会计室和小学。

只楚的大街是全村地势最低的地方,每到下雨,全村的雨水都汇到这里,然后流到村外。遇到大雨,大街就变成一条大河,大水潢潢的,因此沿大街的房屋都建在高台之上。大街中间北侧有一家住户,地基垫高后,房子离大街远一点,门前就有了一片空地,这家人在临大街的一边修了近10米长、1米多高的石堰子,就形成一个剧场舞台大小的场地,农忙时作晒粮食的场院用,平时就是村里人休闲拉呱、消暑纳凉的好去处。孩子们不帮家里干农活的时候,就都凑到这里,少时十个八个人,多时二三十人,有打弹球的、打纸四角的、跳方的、踢毽的、拍贴的、弹杏核的、拾把骨的等,有的是东西可玩。

村里人演剧,这里就成了戏台,恰巧看台的南侧是一片斜土坡,犹如看台,这里俨然成了一个天然的露天剧场。每年夏收以后的农闲时和春节前后,是戏台最热闹的时候。盛夏的时候,农田的活计松懈一些,晚上村里人都到大街两侧乘凉,村里的剧团就开始在土戏台上演出了。白天开始装台,在戏台四角事先挖好的深洞里插上四根高高的杉木杆子,然后爬上梯子,用四根粗长的竹竿把四根杉木杆的上头连绑起来固定好,再在四面绑一些竹竿,这样一可以加固,二可用来挂汽灯、道具和幕布。晚饭前,戏台就装好了,静等着开演了。

春节前后,演出最频繁,台子装好了就不拆了,一直到年后二月二。来演出的也多了,一些村的文艺团体也来交流演出,有时烟台的剧团也来,大多数是本村人演、本村人看。有好的演出,周边的南仓、北皂、孙家庄、东南哨等一些村庄的人也跑来看,熙熙攘攘,热热闹闹。

村里排演的剧目都是吕剧,古装戏《王定保借当》《王汉喜借年》、现代戏《李二嫂改嫁》等等。

演出的次数多了,许多唱段小孩们都会唱,如“大雪飘飘年除夕”“清明佳节三月三,老师傅踏青去游玩”“李二嫂眼含泪关上房门”这些唱段,大家凑在一起咿咿呀呀、装模作样地唱着。这些剧目虽然演出过多次,因为都是本村人演的,一点儿也不影响“上座率”。每次演出,最兴奋的是小孩们,晚饭吃了个半饱就跑去占座,开演前台上台下到处乱窜,不断地掀开幕布角,向台下透露幕后的“秘密”。大幕拉开,他们也会安安静静地看戏,大幕一拉上,他们又活跃了。

1959年,这个土戏台迎来了它的“高光时刻”。中国京剧大家奚啸伯先生在这个土戏台上演出了京剧《空城计》,是为驻只楚村南的解放军慰问演出的。消息一传出,周边村庄的人来看不说,有人从30里地以外的福山城也赶来看戏。那一天,大街上人山人海,戏台前的中间位置坐满解放军战士,一个个方队整整齐齐,歌声此起彼伏,《我是一个兵》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《志愿军军歌》等歌曲唱得气势磅礴、雄浑嘹亮。“唱得好不好、妙不妙,再来一个要不要”“叫我唱我就唱,扭扭捏捏不像样”“一连来一个,一连来一个”的拉歌声一浪高过一浪,犹如排山倒海。顺着大街的东西两侧,大街南面的土坡上、沿街的头墙上、窗户里都是看戏的人。

那天奚啸伯演的剧目是《空城计》,戏台中间擦了几张八仙桌子,前面挂一块画了城墙和城门的幕布,就像一座城楼。城楼前两个老军,手持扫帚,懒懒散散,是两个丑角。当奚啸伯演的诸葛亮在两个琴童陪伴下登上城楼,一亮相就是一个满堂彩,板弦一响,奚啸伯开口唱道:“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”,底下一片叫好声。白花脸扮相的司马懿上场后,诸葛亮悠然抚琴,唱“我正在城楼观山景”这一大段唱腔时,台下的戏迷们听得如痴如醉,享受着奚派大师的“洞箫雅韵”。看到诸葛亮观山赏景、饮酒抚琴,其沉稳大气、云淡风轻的样子,让司马懿满心狐疑,惊慌失措,急急下令撤兵。当剧情演到蜀将赵云一身盔甲上场,威风凛凛,追得司马懿落荒而逃时,人人都觉得真带劲!

60多年过去了,只楚村的大街如今已成了一条宽广平整的大道,大道两边高楼林立,建起了现代化的社区。然而,湮没在时光深处的土戏台,依然在人们心中留下一抹淡淡的乡愁,也留下一代京剧名生奚啸伯的悠扬余音。

往事如昨

两把杌子

姜惠泉

在我房间一个不起眼的角落,有两把熟悉的杌子,漆皮斑驳,露出木头本来的面目。看着这两把敦实牢固的杌子,我的思绪不由飘到了四十七年前。

1979年,我们全家告别了不足20平方米的两间半小南屋,搬到翻新的四间宽敞明朗的房子。这座房子原来是我三爷爷的旧房子。三爷爷没有儿子,唯一的女儿还是三奶奶改嫁带过来的。三爷爷去世后,精神失常的三奶奶被她女儿接到沈阳去了。三奶奶走的时候,这四间房屋已经破烂不堪,很快西边用麦秸草覆盖的屋顶便塌陷下去,黄泥壑垒砌的西山墙也摇摇欲坠。爸爸写信给姑姑,说明了房子的情况。姑姑回信让爸爸全权处理。

得到了姑姑的授权后,爸爸跟妈妈商量,决定把三爷爷的这四间房子收拾好,搬过去住。于是,爸爸就找人帮忙制作盖房子用的“石灰壑”。这种“石灰壑”是老家一种特有的建筑材料。先把当地生产的石灰用水淋透,生成石灰粉,再挖一个大土坑,在坑口铺上一块塑料布,防止土块混入。接下来,找一口大铁锅,放入石灰粉,倒满水,用铁铲在里面不停搅动,再把混合着石灰粉的水浆倒进土坑。这样反复几次,最后把剩下的石灰渣子铲出来放在一边,就得到了纯净、洁白如凝脂的石灰膏。再用这些石灰膏和着沙子,用模具做成盖房子用的“石灰壑”。

我们当地把这种制壑过程称作“磕壑”,这是需要四五个人密切配合才能完成的流水线作业。一条长板凳,两套模具,负责“磕壑”的两个人胸前围着黑色橡胶做的围裙,手上戴着橡胶手套,防止石灰烧伤皮肤。他们把模具在水槽里润湿后,放在长凳上。左右两个人把和好的灰浆用铁铲铲起,狠狠地摔进模具,嘴里喊着“嗨哟,嗨哟”的劳动号子,用铁铲在上面用力拍下,一时水浆四溅,把“磕壑”师傅溅得满身都是白点子。师傅端起模具快速磕在地上,用手拉住模具的两端,慢慢地往上提,两块“石灰壑”就脱颖而出,稳稳地立在地上。如此往返,不多一会儿,一块块像豆腐一样的“石灰壑”白花地摆满了场院。

“石灰壑”的抗压强度并不高,但是它抗雨水冲刷的能力比土壑要强很多,又比青砖便宜许多。在经济困难的时候,成了我们当地人二不的选择。

一切准备就绪,爸爸选择吉日开始动工。把已经坍塌大半的西山墙推倒,用“石灰壑”砌起了一面新山墙;把屋顶全部扒掉,换

掉了断裂的檩条,重新用高粱秸秆作屋笆,在上面抹上和着麦秸草的黄泥,再用麦秸草覆盖屋顶;原有的木头窗,也换成了明亮的玻璃门窗;房子的内外墙也用石灰粉刷一新,光洁而又明亮;土地面也换成了又硬又平的“窑渣”地面——这在当时也并不多见。倒塌的院墙也用石头重新砌了起来,还在院子东面盖起了三间平房。屋面是用水泥板铺就,在上面抹上水泥,可以在上面晒粮食。这也是我们村第一个平顶厢房。

房子收拾妥当,搬家的日子到了。太阳还未升起,大地还在沉睡,我和姐姐被妈妈从梦中唤醒。只见昏暗的小油灯,豆粒大的火苗在黑夜中跳动,爸爸和妈妈已经把家当打成大大小小的包裹。他们拿着大包裹,我和姐姐拿着小包裹,在漆黑的夜里一脚深一脚浅地跟在后面,既紧张又兴奋,一趟一趟搬往新房。爸爸还嘱咐我们不要大声说话,不要让别人看到。

小物件搬完后,等到天明,爸爸又找人帮忙,把面瓮、水瓮、柜子等抬了过去。小房子里的东西搬到新房子里,就像小孩穿着大人的衣服,显得空荡荡的。妈妈又找来木匠,打了一套饭柜,上面一层做了纱门,下面一层的门玻璃上,爸爸还专门跑到数十里外的县城,让人画了一幅牡丹和梅花图案,给这套饭柜画龙点睛,左邻右舍争相参观,赞不绝口。

做完这些事情,妈妈还觉得来了客人缺少坐的东西,于是就委托邻村的表姑帮忙物色一对杌子。表姑是爸爸二姑家的表姐,跟爸爸同年生人,跟我们家的关系特别好,走动频繁。一天晚上,我们到表姑村看电影。表姑告诉妈妈说,她邻居有对红杌子想卖,就领着妈妈过去看。妈妈一眼就相中了这对粗壮敦实、泛着红光的杌子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,最终20元成交。

看完电影后,我们四人就轮番把这对杌子扛回家,三四里的路程也没有觉得累,反而很兴奋。

回到家里,妈妈把它们摆放在最显眼的地方,一进门就能看到这对光彩夺目的杌子。来了客人,妈妈总是热情地让客人坐在上面,仿佛只有这样,才能发挥这对杌子的最大价值。

后来我们又盖了五间新瓦房,除了这对杌子,又添了很多新家具。再后来,爸爸因病去世,我和妈妈来到烟台生活。这对杌子也辗转来到烟台,跟我们生活了三十多年。妈妈前些年也去世了,只剩下这对失去光泽的杌子,还在角落里默默地陪伴着我。